

璧合珠联传名迹 觅寻丹青姊妹篇

——1983年金秋上海市政协书画室云南采风行笔会记忆

孙炯



《南国春意图》由江一波首先开笔，用老辣的笔触画下二棵传统花鸟画中所有的题材——南疆热带植物番木瓜，撑起全图的大结构。（江小梅 供图）

在云南省政协大楼内，展示着一幅上海画家所创作的《四季如春图》；而在上海市政协也珍藏着一幅云南画家的《南国春意图》。这两幅画都创作于1983年10月15日上午的一场笔会上，画作的背后有什么故事呢？云南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孙炯亲历了两幅画的创作过程。

海派画家云南行

1983年10月12日至11月9日，应云南省政协邀请，上海市政协书画室赴滇学习参观团到昆明、大理和西双版纳参观写生。

参观团经历两小时50分钟，跨越2080公里的空中航程抵达昆明后，即马不停蹄赴西山森林公园写生，团长（时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张承宗写下感怀诗句：“摩天飞越四千里，万紫千红迎秋魂，画家不老生花笔，徒步西山写龙门。”

参观团副团长是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中国画院代院长唐云，团员有：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叶元、江华，心脏内科专家黄铭新教授，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王个簃，画师朱妃瞻、应野平、黄幻吾、张雪父、钱君匋、吴青霞、陈佩秋，以及老画家唐云儿子唐逸飞、王个簃儿子王公勋、朱妃瞻老伴陈瑞君随行，上海市政协、市委统战部干部于文清、陈平田一共18人。

在云南采风期间，大家对祖国的壮丽河山、富饶的自然资源、丰富的民族文化风情叹为观止，对改革开放给各族人民带来的巨大变化有着相当深刻的印象。

画家们面对着番木瓜、棕榈、山茶花、爆竹花、鸡蛋花、大树杜鹃花、石斛、细桂花、珠兰等只闻其名、未曾谋面的奇花异卉更是欢喜雀跃，都迫不及待地支起画架，拿出速写本，对景写生。参观团的9位老画家平均年龄76.6岁，但他们不服老、不怕苦，一路上不顾疲惫，每到一地都勤奋创作，不仅积累了大量的写生素材，而且积极创作，为第二年上海市政府举办的“赴滇写生画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这样走进边疆、深入生活、贴近群众的做法，给当时参加接待的云南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博得了参与交流的云南书画家们的诚挚赞誉，为上海市政协书画室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今天回想起来，大家对这些老一辈书画家仍感佩不已。

“一路黄金满地铺，人民团聚共观

娱。烹茶煮酒情如许，论字谈诗更作图。”临别之际，以画锦鲤、芦雁和仕女知名的73岁女画家吴青霞激动地写下了这首绝句。回到上海后，唐云、王个簃、朱妃瞻、应野平、黄幻吾等画家纷纷表示，通过这次云南行的学习参观活动，不仅提高了大家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各项政策的认识，开阔了眼界，而且进一步认识了云南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也为增进滇沪两地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挥毫绘就姊妹篇

为欢迎上海市政协书画室赴滇学习参观团的到来，云南省政协于10月15日上午在省政协礼堂举行茶话会，共述滇沪两省情谊。省政协、省文联、省美协和在昆的书画界人士共150余人出席。茶话会后接着开始了笔会交流活动。

在礼堂大厅纵列着两张大画桌，铺陈着两张丈二匹的大幅安徽宣州出产的优质红星牌宣纸，上海和云南的画家分别在两张大画桌前挥毫创作，在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创作完成了两幅风格迥异、艺术精湛的花鸟画巨制。

上海的巨幅画作由当时87岁高龄的美协上海分会副主席、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王个簃开笔，老画家在儿子王公勋的配合下，以篆籀的笔法和古雅的色彩从画幅的右下角起笔画出十几朵怒放的花茶，点引南疆春色。紧接着，73岁海派画家唐云用小写意笔法给红花茶陪衬数枝娇黄的迎春花，老干新花，很富诗意。与此同时，91岁高龄的上海中国画院画师、美协上海分会常务理事朱妃瞻从画幅中央用豪放的枯笔绘出枝干粗犷的墨兰。随后73岁的山水画家应野平、77岁岭南派老画家黄幻吾、76岁的书画篆刻家钱君匋、女画家吴青霞、72岁老画家张雪父和60岁的上海中国画院女画师陈佩秋依次落笔，画上了墨色淋漓的卵石、玲珑的红梅和山雀、淡雅的水仙、浓艳的大丽菊、挺秀的牡丹和峥嵘兀立的怪石，构成了一幅春意盎然的《四季如春图》。

最后，王个簃提笔赋诗一首：“昆明满园春光好，四季如春万象新。今日挥毫多壮志，千姿百态振精神。”上海画家的这幅《四季如春图》构图奇兀、色彩泼辣，9位画家相互配合、协力创作，可谓集海派花鸟精华于一幅。

在云南画家的画案前，著名画家刘华轩、江一波、黄继龄、张苇研、邱森合作

绘制了另一幅丈二巨幅《南国春意图》。首先由75岁的江一波中锋开笔，南疆热带植物中独有的番木瓜树跃然纸上，几株粗犷的树干撑起了全幅大构架，笔势显得老辣、苍劲。

江一波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最早表现西双版纳热带风物的中国画家，他的创作拓宽了中国花鸟画的表现领域，由此奠定了他作为20世纪中国花鸟画一代名家的地位。在笔会上，江一波与半个多世纪未曾谋面的老师王个簃共聚一堂，白头师徒把手相顾，感慨万千。

无独有偶，唐云也在笔会上见到了睽违40多年的老朋友——云南著名国画画家张苇研。二人青年时代在南京中央医院卫生事业处时，常与高逸鸿等画友切磋画技，他们合作的《松壑泉鸣图》曾入选《第一届全国中国画展》。老友重逢异常激动，当场作诗一首：“相逢惊喜唤侠尘，四十年前若此邻。料否春城能再见，白头少聚几今人。”

当天下午唐云在儿子唐逸飞陪同下乘坐省政协安排的轿车，专门到昆明长春路象眼街老友家中探望，欢叙之余二老提笔合作了《梅竹双清》四尺整幅，唐云题诗一首：“横斜苇研笔无尘，要我琅玕做比邻。永挂高堂成欣赏，休分尺寸与旁人。”并落款“张苇研老友画梅，囑杭人唐云补竹并题”。在昆明期间，张苇研专门陪同唐云父子探访金马山下的昙华寺，观兰品茗，并在其弟子、国画家赵正能引领下观赏了朱德元帅赠映空老和尚的诗碑。

笔会上，张苇研纵笔画下横跨画幅的一方墨韵醇厚的巨石。这时84岁高龄的著名老国画家刘华轩在树干和巨石上画了7只顾盼灵动的八哥鸟。时年70岁的著名金石书画家黄继龄以书法入画，以朴拙的草书笔法画了大叶岩角藤和仙人掌，使整幅画面更显示出琳琅的水墨韵味。最后由云南艺术学院美术系副教授邱森画大青树、热带寄生兰和石斛，完成全画。云南书法家孙太初在画幅左上角书写“南国春意”四个篆字。

两幅大画完已近中午12点，王个簃、唐云、张雪父、钱君匋、陈佩秋等几位上海画家专门走到云南画家的桌前，与刘华轩、江一波、张苇研、黄继龄等握手庆贺，对《南国春意图》颇为赞誉。随后张承宗、唐云和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梁家、杨明在媒体记者的闪光灯下和大家热烈的掌声中，互赠了两幅作品。

上海画家创作的《四季如春图》今天完好地展示在云南省政协大楼内；云南画家的《南国春意图》珍藏在上海市政协。

转眼近40年时间过去了，这两幅凝结上海、云南两地老一辈著名画家卓越艺术成就、记录着深厚友谊的画坛姊妹篇，在岁月的更迭中历久弥新，在未来的时光里永放异彩！

（本文经云南省政协供稿。文章参考了当时参加创作的云南画家、后到北京服装学院任美术系教授的邱森和上海市政协书画室赴云南学习参观团秘书长、时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江华的回忆录，以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叶元的《赴滇写生日记》。）

丁到南京访问，重提当年之事时，推测道：“可能他（司迪尔）塞给无线电发报员50元钱或其他什么东西……那时我年轻又是新手，而司迪尔是个行家，他抢先登出了南京大屠杀的新闻。”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在12月15日刊登了报道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司迪尔实际上成了报道南京大屠杀的第一人。司迪尔还以《太阳报》和《每日邮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向两报拍发消息，两报也分别以《地狱般的南京沦陷，记者离开时看到了残酷的大屠杀》和《我看到了300人被屠杀》为题，刊登了司迪尔的报道。

虽然两报用到了“大屠杀”和“屠杀”的词汇，且指出大屠杀发生地在南京，但毕竟未能完整地直接提出“南京大屠杀”一词。直到12月17日，“瓦胡号”到达上海后，德丁才将他的新闻专电拍发给《纽约时报》。该报在第二天即1937年12月18日刊登了德丁写的这篇报道，题为《所有俘虏均遭屠杀》，副题为：“日军在南京制造恐怖，平民也遭杀害，美国大使馆遭侵袭；蒋介石战术错误以及领导人逃离导致首都陷落。”由于《纽约时报》影响远比《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要大得多，而且德丁在报道中第一次使用了触目惊心的“南京大屠杀”一词，因此，这篇报道引起了世界舆论更强烈、更巨大的震动与反响。而此时距南京沦陷、日军展开残酷的大屠杀仅6天时间。

接着，有更多的西方记者报道了日军南京大屠杀。还有当时在南京城中的西方侨民，也以不同方式向全世界揭露了南京大屠杀。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费孝通给学生“泼冷水”

顾燕

费孝通先生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有时为了学生的成长，他会毫不留情地给他们“泼冷水”。

十三届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教授丁元竹讲过这样一件事。20世纪90年代初，丁元竹顺利地完成了在北京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第二天，他兴致勃勃地去见导师费孝通先生。

费老问他：“你觉得昨天的答辩怎么样？”丁元竹挺自信地回答：“我感觉挺好的，老师们评价都挺高的。”

费老严肃地说：“小丁啊，你太不懂社会了，人家说你不好，不是因为确实写得好，是大家看了我的面子。你是学习社会学的，要对

社会有深刻的认识。”丁元竹一时有点懵，没想到导师会这样说，但反过来一想，费老所说的又无不道理。

费老转而又和蔼地说：“小丁啊，你现在从北大毕业要做老师了，我送你六个字：著书、立说、立人。在北大教书，不著书自然立不住；有自己的著书没有自己的理论和观点，自然也不能立住；写了书，有了自己的观点，做人不行，最终要完蛋……”

丁元竹默默地回味着导师的这句话，感觉句句在理，这无异于导师对自己的临别赠言啊，是无价之宝。

多少年过去了，费孝通先生也去世几十年了，但丁元竹一直想着先生当年的那一盆“冷水”，同时更铭记着先生当年的那番话，“著书、立说、立人”已然成了自己的座右铭。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启功笔出妙词

杨建民

说起启功先生，人们通常以书法家视之，这当然没有问题，可这个头衔不能涵盖启功的深厚造诣和广泛的学养——他的绘画就颇为杰出，古典研究亦有可观成绩，诗词写作也自成一格……他还智慧灵透，有立笔迅疾的才华。

他的友人黄苗子曾记述有一事。说旅居海外的熊秉明教授一次回国讲学，因为其在书法研究方面成就突出，又是书法界同仁聚会，大家便请熊秉明写字作为纪念。熊秉明想到自己在台湾举办个人展览时，写过一首作为展出序言的新诗，就将第一段书出（原作无标点）：

展览 展览/展出什么呢/这个世界已经太满/红灯 绿灯 红灯/绿灯 红灯 绿灯/你的眼睛已经超重/超速/你的眼睛已经故障/慢下来 停下来/给你以新的看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赵元任的好奇心

王剑

赵元任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在数学、物理、哲学、语言学、音乐等领域均有建树，是世所公认的“学术通才”。

赵元任始终对新奇的事物保有强烈的好奇心。小时候，有人送他一个放大镜，他自己琢磨出好几种玩法；上大学时，赵元任突发奇想，把直饮水的正负极放到舌尖上，亲口品尝了“电”的味道；出于兴趣，他专程带家人到野外去看日全食、月全食，还利用针孔原理给孩子们演示日食的过程；觉得好玩儿，他花大价钱买了一台双镜头照相机，拍了很多立体照片。

赵元任认为，世上最好玩的莫过于语言。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巡回演讲，清华大学委派赵元任做翻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当地的方言来翻译。比如，在上海，就用上海方言；到杭州，便用杭州方言。路途中心向湖南人学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人跑

来和他攀老乡。此次罗素的讲学之旅，赵元任的语言天赋得到检验和好评，他自己也决定将语言学作为终身的主要职业。

有一次，大女儿赵如兰将孩子送给赵元任夫妇看管。赵元任突然对婴儿的声音十分好奇，便将咿呀学语的“发言”做了详细的录音记录。不久，赵元任写出了一篇科学论文，论述的内容正是语言学中少见的婴孩语言问题。

赵元任是中国第一位用科学方法作方言和方音调查的学者。在清华大学和语言研究所任职期间，赵元任带着十几个学生，专程到江苏、浙江、安徽、湖北等地作调研，考察和记录了近60种方言。在他的影响和指导下，王力、朱德熙、吕叔湘、丁声树、杨时逢、吴宗济等人，都成为中国语言学界的重要人物。

旅居美国期间，赵元任的研究方向转向了汉语语法和普通语言学领域。他出版的《中国话的文法》一书，被誉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扛鼎之作，在汉语语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杨靖宇学唱《国际歌》

周星

姜椿芳是我国当代著名翻译家；新中国文化教育、编辑出版事业、外语教育事业奠基者之一。16岁那年，他北上哈尔滨谋生。在九一八事变前夕，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先后担任哈尔滨团市委及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开始了革命生涯。

1933年农历五月，满洲省委决定利用端午节借作掩护，在姜椿芳家召开一次省委扩大会议。姜椿芳也前来参会，并在姜椿芳家住了一个多月，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这一个多月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姜椿芳更加了解杨靖宇的不平凡的经历。在杨靖宇面前，姜椿芳无话不谈，无话不说。杨靖宇一边抓紧时间读文件，一边还帮着做家务。有一次，杨靖宇在姜椿芳家偶然发现一张《国际歌》歌单，

那铿锵有力的词句，激动人心的旋律深深地震撼了他。于是他开始低声地学唱起来，虽然不敢大声唱，但声音里却饱含着激情和力量；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每唱一遍，杨靖宇就说：“太好了，唱着这样的歌，就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杨靖宇接着又对姜椿芳说：“我要把这首歌带到部队，带到抗日前线，教战士们唱。”

杨靖宇不仅唱《国际歌》，他还决定自己创作一首《东北人民军军歌》。在吉林集安五道沟，杨靖宇提笔创作了著名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并亲自向部队教唱。豪壮的歌声，振奋了军威士气，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传播了党的抗日政策，展示了东北抗联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和豪迈气概。

最早揭露南京大屠杀的外国记者

钱国宏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侵华日军在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了长达6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和奸淫、放火、抢劫等暴行。当时，《纽约时报》《芝加哥每日新闻》《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中外媒体，均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大量的报道。那么，谁是最早报道南京大屠杀的新闻记者？

长期以来，许多学术著作都说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弗兰克·提尔曼·德丁是最早揭露南京大屠杀的外国记者。因为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著名的报道《所有俘虏均遭屠杀》，震惊了世界。但经仔细检阅与研究，德丁发表此文是在1937年12月18日（美国时间）。而在此文发表前3天即12月15日，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记者阿契包德·特洛简·司迪尔就在该报上发表了题为《日军杀人盈万》的报道，该报道的副题为：“目击者叙述刚刚陷落的南京城‘四天地狱般的日子’，马路上积尸高达五英尺。”

这才应该是公开刊出的第一篇向世界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报道，司迪尔是第一个报道南京大屠杀

的新闻记者。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一方面进行有计划的血腥大屠杀，另一方面则对南京进行严密的新闻封锁。日军当局将南京城内的中国新闻传媒机构捣毁、破坏一空，切断了南京与外界的所有电讯联系，“里不出外不进”，严禁一切中外新闻记者进出南京。同时，日军当局严禁向国际新闻界提供有关南京状况的任何信息。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南京成了全世界新闻报道的“盲区”和“孤岛”。为了欺骗世界、掩盖罪行，日本新闻传媒向全世界发出了“南京获得新生”“南京一片祥和”“南京人民喜迎解放、感激皇军恩德”的虚假信息。因此，在日军占领南京后连续数天，中国与西方新闻传媒对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几乎没有任何报道。

在这极其危险的时刻，有20多位西方侨民冒着生命危险，坚持留在南京城内，设立“安全区”，救护中国难民。另有5名西方新闻记者冒着生命危险留了下来。这5名记者分别是：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弗兰克·提尔曼·德丁、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阿契

包德·特洛简·司迪尔、美联社记者查尔斯·叶兹·麦克丹尼尔、英国路透社记者莱斯利·C·史密斯、美国派拉蒙新闻电影社的摄影记者阿瑟·B·门肯。这5位西方新闻记者成为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者、见证人与报道者。

这5位记者目睹了日军攻入南京、连续数日对放下武器的中国战俘与手无寸铁的中国居民疯狂屠杀的惨烈景象，却无法把这些南京的真相迅速报道出去。因为当时的南京已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电讯机构与设备。南京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都已被日军切断，他们只能前往上海。1937年12月14日，《纽约时报》记者德丁驱车离开南京前往上海。但是日军当局已颁布出城禁令，所以德丁的车到了南京以东约50公里的句容即被当地日军挡了回来。经交涉，日方允许德丁、司迪尔、门肯、史密斯等4位西方记者于12月15日乘美国“瓦胡号”炮舰离开南京前往上海。

登上“瓦胡号”后，德丁即要求拍发有关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无线电新闻，却以违反规定拒绝；同时登上“瓦胡号”的司迪尔在船上将来自南京的消息《日军杀人盈万》发给《芝加哥每日新闻》。50多年后，垂暮之年的德